

# 初心的回响

——歌曲《东方红》创作前后

■钱均鹏 党捷睿

## ★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在中国，有这么一首歌，它诞生于黄土高原，被改编和广为传唱后，不仅创造了演唱人数和演唱次数的纪录，还曾搭乘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这首歌就是《东方红》。

### 东方红 太阳升

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人们总是习惯用歌声来抒发情感。每当东方露出晨曦，黄土地上便会响起粗犷豪放、热烈率直的歌声。“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见不上个面，招一招手……”陕北的沟沟壑壑限制了人与人地域间的交往，却阻隔不了原生态的民歌在大山间回荡。

1903年，在陕北佳县张家庄一户穷苦农民家里，李有源出生了。家境贫寒的他只念了几个月私塾就回家当了放牛娃。虽然生活艰难，但在放牛时，他总是带着书本，一有空就念念写写，对着大山唱信天游。听着沟底山羊的叫声，吃糠上吹牛的嘶喊，他练就了“揽羊嗓子回牛声”，不但能唱民歌，还能写一些民歌。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好日子，纷纷用歌声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拥护。李有源也编了一首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穷苦人翻身当了家。毛主席领导咱闹革命，昔日牛马坐天下。”

1938年，我国著名音乐家安波等人将流传于西北的民歌《芝麻油》填上了新词。“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填上新词的歌，名叫《骑白马》，契合了全民抗战的心声，很快便

在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李有源觉得自己以前是受苦的农民，新社会使他翻了身，就想写一首能反映像他这样的劳动人民心声的歌。但接连写了好几首，他都不满意，总觉得不能完全表达内心的感受。

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起了个大早，挑着担子进城卖菜。当他爬上一道山岭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陕北高原，也照亮了他的心。他突然想到，毛主席和共产党不正是驱散黑暗，给人民带来光明的红太阳吗？咱老百姓世世代代受苦，眼下好日子才开头，不就像这眼前旭日东升的光景吗？于是，他情不自禁地用《骑白马》的调子唱出了头两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又想到，自从佳县解放，人民翻了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强。要不是毛主席的好领导，哪有老百姓的今天？于是，他又接着唱出“他为人民谋生存”这一句。但最后一句卡住了，一时想不出来。他挑起担子往县城走，边走边想。当他走到城墙根前，看到墙上写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时，心里一下子豁然了。这不正是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吗？于是，最后一句歌词也编了出来：“他是人民大救星。”

就这样，第一段有了。他又写出了第二段、第三段……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因为第二段后面的歌词都是反映老百姓响应边区政府号召，移民开发荒山、追求幸福生活的，所以歌曲起名《移民歌》。此后，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也改编和多次演唱这首歌。

### 从《移民歌》到《东方红》

1944年2月，作曲家马可随延安鲁艺秧歌队来到佳县慰问演出。当演出队归来准备休息时，突然从窗外传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这曲调熟悉、歌词新鲜的歌声一下子吸引了大家。他们循着歌声找过去，看见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这个青年就是李增正。经过李增正的引见，马可在第二天见到了李有源，了解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并记录下歌词。

不久，马可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群众是怎样创作的》，介绍了李有源和他的侄子李增正如何编写《移民歌》，并刊登了歌词。

1944年秋末冬初，文艺工作者公木、孟波、刘炽、于蓝等在各地收集民歌时，将这首在当地广为传唱的《移民歌》收进了《陕北民歌选》一书。此时，歌名还叫《移民歌》。

1945年9月，为响应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公木、刘炽与鲁艺师生60余人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起程前往东北。

抵达沈阳后，文工团决定组织一场文艺晚会来宣传党的政策。在筹备过程中，公木、刘炽、高阳、田方等人着手改编《移民歌》，作为晚会的重头戏推出，由公木负责记录、整理。其中，第三段“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是公木在行军途中写的诗《出发》中的句子。公木还将第一段歌词中的“谋生存”改成了“谋幸福”。新歌完成后，作曲家刘炽在《骑白马》小调基础上对速度、节奏、唱腔等都做了相应的加工，并把歌名由《移民歌》改成《东方红》。这首歌在晚会上一经演出，便立即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 从“谋生存”到“谋幸福”

从《移民歌》到《东方红》，李有源是最

早的编写者和传唱者。在传唱过程中，参与改编并知道姓名的就有李增正、马可、公木、刘炽、高阳、田方等。正如李有源自己所说：“《东方红》不能说完全是我一个人创作的。那是许许多多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集体创作的。”

《东方红》不仅是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也是人民情感的真挚表达。从最早的“他为人民谋生存”改成“他为人民谋幸福”，见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不只是为了谋生存，更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建成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因为“毛主席，爱人民”“共产党，像太阳”，所以人民才会自发地赞颂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是我们的带头人”，才会自发地歌颂共产党“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才会经久不息地传唱《东方红》。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时刻，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由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东方红》随着广播，响彻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乐曲《东方红》伴随着卫星升入太空，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走进新时代，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民间音乐沃土，表达人民朴素心声的歌，又通过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绎为多种版本。《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

## 阅图

### 纳冬储

■摄影 周凯威

进入冬季，为使官兵能在寒冬季节吃上美味可口的蔬菜，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炊事班的战士们开始了新的忙碌。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战士们晾晒白菜的场景。画面构图饱满，具有生活情趣，人物表情喜悦生动，展现出基层官兵的朴实与快乐。

(杨勇涛)



## ★ 迷彩芳华

时光已匆匆流过20多年，但当年在军校看电影的种种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94年9月，我考入原南京炮兵学院。记得第一天报到时，经过学院大礼堂路，看到北操场南侧有一块长约20米、高约15米的白色水泥墙，正对着马路东面的大礼堂，墙的东侧是一块非常开阔的水泥地。当时不知道这块地方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听中队的教练班长说，这是学院的露天电影场。那块水泥墙就是电影屏幕，电影机在大礼堂三楼，每周四放电影时通过窗户投放到水泥墙上。入学大约一个多月，我们外出拉练结束后，崭新的制式皮鞋发下来了。教练班长说道：“发皮鞋了，以后就可以看电影啦！”听了这话，大家颇为不解，难道看电影还非得穿皮鞋？

发皮鞋的第二天，中队找来补鞋匠，给我们每人的皮鞋底前后左右钉了4个铁鞋掌。穿着皮鞋走在水泥路上，“咔咔”的声音十分响亮，让穿惯了“解放鞋”的我们一时竟有些不适应。

周六早晨，中队值班员通知：“全队早饭后着常服，穿皮鞋，不扎外腰带，带马扎，中队门前集合，训练看电影。”

听到通知，大家都有些纳闷：“看电影咋还训练？”

集合后，听队干部下达完训练课目，才知道是训练看电影的人场式。由值班员带队，我们140多名学员成4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第一次来到电影场。

入场式训练主要包括“带马扎跑

## 看电影轶事

■项志明

步、立定，整队，放马扎，坐”几个内容。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跑步要求整齐划一，“砸”地有声；呼号要求声音洪亮，短促有力；立定要求准确到位，靠脚有力。这时候皮鞋上的鞋掌就起作用了，哪怕有一个人跑或立定不整齐，都很容易听出来。

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放马扎”。放马扎，分为准备马扎、放、起3个动作。准备马扎时要求身体不动，左手将马扎递到身后，右手打开马扎并握住马扎外侧上方支架，听到“放”的口令后，要统一身体向右下方倾斜，背部要基本保持在同一个平面，同时将马扎放置身后。说放置其实并不完全对，准确地说应该是“砸”到身后，“砸”地时必须迅速干脆、整齐有力。起身后，马扎须保持横竖都在一条线。刚开始，大家怎么都放不齐，“砸”地的声音七零八落，此起彼伏，起身后马扎也是横七竖八，甚至有倒在地上的。经过几次训练，总算是有模有样了，140多人基本能保持一致。

最后一个内容“坐”相对简单，但要求也不低，大家须基本在一个水平面上坐一下。按照队干部的话说，整个队伍坐下的过程要像一整块板子似的落下，不得上下起伏，坐下后要双手放膝盖，挺直腰杆，纹丝不动。

上午训练结束，队干部集合讲评时专门说道：“根据学院通知，下周四晚，新生就可以参加看电影。但能不能看，还要看大家后面几天的训练情况，训练效果好，可以看；不好，下周四晚上只能在南操场训练入场式。”

入校近两个月，一直忙于训练，大家都对看电影充满期待。因此，接下来的几天，大家都铆足了劲，休息时间也会自觉地练习“放马扎”。

终于等到周四。因为有了几天来的自觉训练，效果比上周六要进步不少，队长那张黑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训练结束讲评时，队长郑重宣布：“今晚看电影！”

晚六点半，值班员吹响集合。队伍带往电影场时，一路上大家心情激动、士气高涨，那感觉仿佛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去参加国庆大阅兵。站在集合地点，第一次看着全院学员列队依次入场，那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仔细听，能听出“老生队”和“新生队”的区别：“新生队”步伐整齐，皮鞋因为是新钉掌，落地的声音比较响，但可能是紧张的缘故，明显节奏有些快，间或还有个人叫了“冒泡”。“老生队”跑起来就自然顺畅多了，不急不慢富有节奏，那声音听着都是一种享受。

## ★ 阅读时光

作为一名战争亲历者，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在作品中总能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塑造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独特的战场环境和战地生活。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借助一种浪漫的美学想象，在战火硝烟中建构军人形象，继《我们播种爱情》和《西线轶事》之后，再一次翻开了当代军事文学创作的新篇章。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吸引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在提高了军队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时亦大幅提升了战斗力。他们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些都为徐怀中的创作提供了动力。他曾说：“到了晚年，我想我应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现在我所写出来的《牵风记》，不是正面去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茧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

小说《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独立第九团在艰难突破封锁、进行战略转移期间，女文化教员汪可逾带着革命信仰投奔光明，却在19岁时壮烈牺牲的故事。全书笔墨的重点没有放在硝烟炮火和宏大战争场面上，而是紧紧围绕一张古琴、一匹马和三个人，谱写了一曲唯美又浪漫悲壮的战地恋歌。

怀抱古琴出现在独立第九团的北平女学生汪可逾，天真、纯净、执着又涉世未深，似硝烟弥漫的战场中的一汪清泉，就这样映入了团长齐竞的眼帘，也逐渐流入了他的心间。汪可逾身上的诗情画意与浪漫主义色彩，既有家庭原因，也出自天性。这种天性仿佛给危险灰暗的战争生活带来了光亮，也带来了希望。

齐竞是第三方叙述主体，在文中重要事件和人物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他是曾留学海外且文化修养深厚的指挥员，擅长带兵打仗，且能与汪可逾进行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但战事紧张，主客观原因导致相互爱慕的两人在战场上必须分开行动。后来，两人产生误会，再次相见时，汪可逾已经牺牲。齐竞因此陷入了漫长的痛苦自责。

在汪卉二人于战略转移中分开时，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作为汪可逾的护送者上升为“第二主角”。他曾是齐竞的警卫员，在书中属于“成长型”形象。汪可逾的才华与性格从某种程度上对“放浪不羁”的曹水儿产生了“净化”作用。

滩枣，是一匹马，善作战、有灵性。行军路上，它是齐竞的坐骑，汪可逾的知音，曹水儿的朋友。它能听懂汪可逾弹奏的《关山月》，能很好地领会曹水儿的意图，能找到汪可逾死后的洞洞。

在徐怀中眼里，这是一部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一边是战火纷飞，一边是高山流水、浓厚的诗意与浓重的悲壮感交相辉映，战争中美丽的容颜、动听的音乐、美好的人性、浪漫的诗情画意与战争的残酷、危险、血腥，形成了鲜明对比。

书中，汪可逾与古琴是一体的。不难看出，二者都是古典与美好的象征。结尾处，古琴被掩埋，汪可逾死亡，齐竞找回的残缺古琴带回家时弹奏，可见古琴是汪可逾的另一种存在，它也见证了所有人的经历和最后的命运。徐怀生在采访中提到：“汪可逾一生梦想所追求的，正是逆时针回返历史的原点，听到这个世界上最初发出的一声古琴空弦音。古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光彩的符号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是塑造汪可逾艺术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同时，我也借用这件古老乐器的

兵 漫

## 铁拳部队铁拳兵

■徐金鑫



1. 侦察敌情练协同。



2. 识图用图习技能。



3. 团结合作砺斗志。



4. 训练场上强体魄。